

浅议《吕氏春秋》寓言的叙事模式

赵 璟

(兰州财经大学长青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吕氏春秋》汲取战国时期散文之长, 借寓言说理。在寓言故事群中, 巧妙将内容上有联系和无联系的寓言故事群进行归整; 同一个寓言中, 采用叙议结合的方式, 寓言中套寓言, 详略得当, 丰富了本体寓言的内涵; 用“对话”方式展开故事情节, 使叙事结构紧凑, 现场感增强; 多种修辞手法、整齐的句式和思辨性的语言有对前代文学的传承与创新。这种叙事模式影响了后世的寓言、史书和小说等。

关键词: 吕氏春秋; 寓言; 叙事模式

中图分类号: I207.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20(2018)04-0078-06

DOI: 10.13874/j.cnki.62-1171/g4.2018.04.017

《吕氏春秋》, 又名《吕览》, 是吕不韦召集其门客集体编纂的一部著作。吕不韦由一个大商人起家, 所谓“奇货可居”, 一直做到秦国丞相。战国时期, 随着周王室的衰微, 礼崩乐坏, 出于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社会的责任感, 各个学派纷纷著书立说, 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无形中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这期间, 散文创作渐趋完备。战国末期, 秦统一六国大势已定, 但是如何守住大秦江山, 引起了丞相吕不韦的担忧。顺应当时著书立说之风, 吕不韦召集其门客为秦国的长治久安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策略, 将其编纂成《吕氏春秋》。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当是时, 魏有信陵君, 楚有春申君, 赵有平原君, 齐有孟尝君, 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 羞不如, 亦招致士, 厚遇之, 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

士, 如荀卿之徒, 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 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 二十馀万言, 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 号曰《吕氏春秋》。”^{[1]700}

《吕氏春秋》在有完整计划、有统一思想体系的情况下编制而成。章学诚提出“杂于己而不杂于众”的主张, 认为《吕氏春秋》“兼取众长”“必有其中心之一贯”。本文采纳洪家义教授的观点“《吕氏春秋》有一贯的指导思想, 有严密的理论体系, 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既不是杂家, 也不是附庸, 实成一家之言。”^[2]

《吕氏春秋》吸收战国时期“历史散文”和“说理散文”的写作技巧, 将其巧妙结合, 并加以创作, 形成以“一贯的指导思想”为主线, 文采上“百花齐放”的局面。从整本书看, 作者在阐述具体观点时, 大多使用“寓言故事”说理。

收稿日期: 2018-04-27

基金项目: 甘肃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吕氏春秋》寓言故事文学价值研究”(项目编号: 2016A-155)。

作者简介: 赵璟 (1983—), 女, 甘肃兰州人, 讲师, 研究方向: 古代文学、对外汉语教学。

寓言是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常常带有讽刺或劝诫性质。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说：“《吕氏春秋》在文学上的突出价值还在于保存了丰富多彩的先秦寓言和历史故事。”^[3]据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统计，《吕氏春秋》中有寓言约300则（列出要目283则）^[4]。这些寓言大都取材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还有些是作者的创造或再创造。向一国之君提出治国策略，要考虑方式方法，既要把观点讲明白、讲清楚，又要让君王易于接受。《吕氏春秋》积极借鉴战国时期策士们进谏的较好方式“托物言志、托事言志”，将自己的观点、策略融入寓言故事中，让统治者听后不言自明，避免了直言犯谏的风险。《吕氏春秋》中不同的寓言出自不同作者之手，在叙事上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文学特色。

一、寓言故事群

《吕氏春秋》共计160篇（包括序意），每篇阐述一个观点，平均每篇有二至四个寓言，均围绕同一个观点展开，形成“寓言故事群”。傅修延先生在《先秦叙事研究》中首次提出“故事群”这个概念。^[5]本文将这些寓言放在一起，先从宏观上按照群落方式来分析其在结构编排上的特色。从内容上来看，这些“寓言故事群”分为内容上有联系的寓言故事群和内容上无联系的寓言故事群。

内容上有联系的寓言故事群中，几个故事围绕相同的主人公展开故事情节，故事和故事之间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行文连贯。如《季秋纪·知士》篇中分四个故事记载了静郭君善剂貌辨、剂貌辨为静郭君说闵王；《慎大览·贵因》篇中记载了武王攻伐的三件事；《季冬纪·士节》篇中分三个故事记叙了晏子有恩于北郭骚，北郭骚以死为晏子洗清冤诬。

内容上无联系的寓言故事群中，故事虽然围绕同一个观点展开，但是故事的主人公、故事情节没有相同点，也无联系。从结构编排来看，又有不同的组合方式：

一是在相同题旨下，将几个寓言故事并列编排，共同说明一个道理。如《季秋纪·顺民》篇，通过《汤身为牺牲求雨》《文王以去炮烙之刑为赏》《越王先顺民心》《攻越先审民心》这四个内容上无联系的故事说明先顺民心，故功名成，以德得民心的道理。

二是每个寓言故事分别从不同角度阐明观点，或阐述观点的某一方面。这里分为两种情况：并列式组合和递进式组合。关于并列式组合，比如《慎大览·权勋》篇提出“要衡量事功大小”的观点。接着，《司马子反饮酒误战》《宫之奇谏假道》《内繇君主因钟失国》《齐王激触子败兵》等四个故事都从“反面”并列说明遇事不衡量事功的大小，就会因小忠害大忠，贪小利失大利。递进式组合，比如《孝行览·本味》篇从得贤角度论述“治国必须务本”的思想。首先由《伊尹归汤》的故事说明君主立功名的根本在于得到贤人，接着由《伯牙子期》的故事进一步指出，得贤必须知贤、礼贤，最后在《伊尹述五味》的故事中由调和五味必须有术，启发天子要得天下必须先懂得大道理，即必须务本。三个故事层层推进，一以贯之，形成递进效果，增强了说服力。

二、叙议结合

赵逵夫教授在其《论先秦寓言的成就》中提出寓言的本质特征：一是简单的情节；二是深刻的寓意。^[6]如果把《吕氏春秋》中寓言的故事称为叙，寓意称为议，其叙议开始呈现出不同的组合方式。

（一）先叙后议

《吕氏春秋》寓言的寓意，大多数出现在故事结尾处，先叙后议。如《离俗览·为欲》篇中的《晋文公伐原得卫》：晋文公伐原，与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谋士言曰：“原将下矣。”师吏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得原失宝，吾不为也。”遂去之。明年，复伐之，与士期必得原然后反，原人闻之，乃下。卫人闻之，以文公之信为至矣，乃归文公。故曰“攻原得卫”者，此之谓也，文公非不

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诚信以得之，归之者非独卫也。文公可谓知求欲矣。^{[7]720}

晋文公与士兵约定以七天为期，即使没有攻下原国，依然信守承诺退兵。卫国人被晋文公的守信而感动，最后归顺文公。文末的评论给君王提供了借鉴：君主必须讲诚信。

（二）先议后叙

少部分寓言，其寓意出现在开头，先议后叙。如《贵直论·知化》篇中的《伍子胥谏夫差》，在寓言开头用一段议论劝谏君王要预见到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以免遭致亡国，“事有可以过者，有不可以过者。而身死国亡，则胡可以过？此贤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轻也。所轻，国恶不得危？身恶得不困？危困之道，身死国亡，在于不先知化也。”^{[7]863}接着详细叙说了吴王夫差贪图眼前利益、不虚心纳谏，终致国灭身亡的故事。

（三）夹叙夹议

还有一部分寓言，类似于夹叙夹议。赵海利、谭家健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称：“从文学史来看，《吕览》的文章属于夹叙夹议体，每篇只讲一个问题，然后提出例证，论点突出，语言浅显。”^[8]如《孝行览·必己》篇中的《竭池求珠》：知与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调近之。犹未可必。盖有不辨和调者，则和调者有不免也。宋桓司马有宝珠，抵罪出亡。王使人问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于是竭池而求之，无得，鱼死焉。此言祸福之相及也。紂为不善于商，而祸充天地，和调何益？^{[7]462}

这则寓言一边叙述一边议论，体现出较灵活的笔法，起到过渡和总结的作用。叙议结合，处处直指寓意，能充分抒发作者的感情，升华题旨。类似的结构形式在《吕氏春秋》寓言中较少，“先叙后议”的结构编排仍占主导地位。

三、寓言中套寓言

《吕氏春秋》寓言的叙事渐渐淡化了死板的说教、论理，无论是故事编排，还是情节设置，都体现出更多的文学性。《吕氏春秋》运用

大量的寓言故事来阐明观点，在一个完整的寓言故事中，插入一两个小寓言，形成寓言中套寓言的形式。作者并没有将这些寓言故事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详有略，在叙述上做到了详略得当：寓言本体详写，故事篇幅较长，有具体情节和细节描写；加入的小寓言一般略写。加入的小寓言有两种情况：

一是用一两句话，把与本章观点有关的部分或寓言的主要内容概述出来，如《孝行览·慎人》篇的《孔子论“道”》中，孔子在陈国、蔡国之间处于困境，弟子子路和子贡在一起说起孔子的一系列不幸遭遇，却见孔子依然在用瑟伴奏唱歌。他们不解“君子竟然这样无羞耻之感吗？”孔子知道后，分别用“齐桓公、晋文公和越王勾践因逆境遭遇而萌生复国称霸之心”的小寓言，告诉子弟们，得道之人，困窘时高兴，显达时也高兴。高兴的不是困窘和显达，如果自身得到了“道”，那么困窘和显达都是一样的。这些加入的小寓言使寓言的本体内容更加充实和生动，增加了本体寓言的故事性、趣味性，使寓意更加明确、更加清楚、更有说服力。

二是仅用几个字，就代表一个寓言。一些寓言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大家耳熟能详，一提它的题目或主要人物就知道它的故事内容及寓意。所以在文章中引入时，不需要详细的叙述和雕琢。在《孔子论“道”》中，文末使用“许由虞乎颍阳”和“共伯得乎共首”这几个字展示了两个寓言，重申“得道”之乐；《审分览·知度》篇中只用“桀用羊辛、纣用恶来、宋用唐鞮、齐用苏秦”就代表了四个寓言，等等。纵观《吕氏春秋》，这类寓言多用“人名”，如“尧、舜、汤、比干、伍子胥”等；有些是“人名加某一表示动作的词组成的短语”，如“荆庄王染于孙叔敖、沈尹筮”等。这种方式使主体寓言故事地位明显，主题突出，避免文章眉毛胡子一把抓，同时这类故事又做了本体寓言故事的补充，丰富了本体的内涵。

四、在“对话”中展开故事情节

《吕氏春秋》中的寓言充分吸收春秋战国时

期诸子百家作文的优点。在故事情节的铺排上，借鉴了《论语》“语录体”形式。如《孟春纪·去私》篇中的《祁黄羊荐贤》：

晋文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讎，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7]28}

整个寓言的发生、发展、结束均以两个人的对话为主展开，提示语仅简单为“平公曰”或“祁黄羊曰”。在《吕氏春秋》中，用这种提示语方式组织的寓言为数不少。基本形式为“A曰……B曰……A对曰……B对曰……”。“对话”，形式简单，一问一答，却很传神，有现场感。A、B作为提示语，大多数情况下只代表说话人的称呼，个别情况下会有简单的修饰语，如“涕出曰”。同时，提示语位置一般在说话内容之前。在现代文学中，提示语位置已经出现了提示语在前、提示语在中和提示语在后等多种形式，提示语的内容也丰富多变起来。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学作品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和演进。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当祁黄羊阐明自己举荐自己儿子的理由后，文中紧接着出现了一句话“平公曰‘善’。”虽然没有辞藻堆砌的提示语，但使人感受到晋文公回答的急迫，我们仿佛看见晋文公此时对祁黄羊回答的肯定和赏识。

在“对话”中展开故事情节，从叙事角度来说，也影响了现代微型小说中“限知视角”方法的出现和使用。作者在叙事之前，不把事件的前因后果、事情的来龙去脉、人物的背景、性格特点、爱好一一列出，向读者交代得一清二楚，只是给出一些碎片化的信息，让读者根据给出的有限信息思考全局问题。随着故事的发

展、推进，碎片化的信息就像沿途飘落的花瓣不时出现，直到最后，读者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全部收集起来，连缀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才恍然大悟作者的创作意图。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碎片化问题的探讨和解答，正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这也是读者理解寓言的关键点。这样写的好处，一是缩短了故事篇幅，二是给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和想象空间。文学作品的魅力就在于用有限的文字给读者无限的感受和想象，《吕氏春秋》的寓言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尝试。

据笔者统计，《汤问伊尹》《何以治国》《赵宣救人》《公孙龙说燕昭王偃兵》《齐桓公伐鲁》《贤主之所求》等近200则寓言故事都使用了“对话”方式展开故事情节。

五、语言运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作者思维的外显形式。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观点和看法通过语言具体体现出来，可以说语言是沟通读者和作者的纽带。《吕氏春秋》的阅读对象是君王，因此，对用语有更高更严格的要求，表述要条理清晰、寓教于乐、不宜呆板和生硬，还要充满文学气息。

（一）灵活运用多种修辞手法

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寓言也不例外。如果说思想是灵魂，结构是骨骼，内容是血肉，那么修辞就是千变万化的着装。恰当的使用修辞，不仅使描述更加生动、形象、丰富、方便读者理解，而且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吕氏春秋》寓言中运用的修辞手法有：明喻、类比、排比、对比、顶针等。

这些寓言中使用最多的是明喻。如《季秋纪·顺民》篇，将“越国”比喻为“猛虎”。《季秋纪·精通》篇中用“若草莽之有华实也，若树木之有根心也”^{[7]274}比喻“一体而两分，同气而异息的骨肉之亲。”《季冬纪·介立》篇中介子推在诗中说道“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雨露。”^{[7]348}将晋文公比喻成龙，自己比喻成蛇，表达了自己辅佐成功晋文公后想要隐居的心意。《孝行览·本味》篇中，钟子期说：“善

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7]416}用“高山的巍峨，流水的激荡”比喻伯牙琴技的高超。

类比的修辞手法通过浅显的、生活中常见的普通事例，映射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深刻道理，帮助读者理解作者的用意。如《仲春纪·贵生》篇中用人体的四肢受到触动无感觉，就不听支配了，类比对君主的号令无动于衷，就无法支配他们。《季春纪·圜道》篇中用五音各处其处，音皆调均，类比百官各处其职，无不安矣。《有始览·谕大》篇中以燕雀欢乐自得自以为很安全，烟囱裂了烧着了房梁，大祸临头不自知，类比臣子只顾自己爵禄高贵，欢乐自得，而没有意识到国家的危机重重。《孝行览·首时》篇中用“饥马盈厩，嗅然，未见刍也。”^{[7]428}类比“乱世之民，嗅然，未见贤者也。”

反问是无疑而问，用在文中主要为了增加语气，重申观点，引起注意。《吕氏春秋》寓言中的反问句，少量用在故事中，推动情节达到高潮，大多用在故事的评述阶段。作者在阐述自己观点、抒发感情时，顺势加入一个反问句，增强语气，突出主题，让人能感受到作者当时激扬的情感。如《仲秋纪·爱士》篇中说，赵简子有两匹白骡，赵简子十分喜爱它们。胥渠是广门邑的小吏。一天，他来到赵简子门前申述自己病了，医生告诉他，如果弄到白骡的肝吃了，病就能好，如果弄不到，就必死。正在一旁侍奉的董安听后恼怒地说，胥渠竟胆大包天算计起主君赵简子的白骡来了，请让他接受死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本想一个小吏口出狂言，多半没命了。没想到，故事峰回路转，赵简子听后说：“夫杀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杀畜以活人，不亦仁乎？”^{[7]243}于是，唤厨师杀掉白骡，取出肝送给胥渠。过了没多久，赵简子举兵攻狄，广门邑的小吏们都争先恐后勇猛出战，纷纷登上城头斩获敌方披甲武士的首级。赵简子大获全胜。文末评论中感慨“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点明观点，升华主题。读者读到这里也和作者一样，为赵简子点

赞，与作者达到情感的共鸣，反思自己，常怀“行德爱人”之心。

（二）整齐的句式

战国后期的作品中，句式开始呈现多样化发展，长句和短句在行文中交错使用，《吕氏春秋》寓言的叙事中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但是在部分叙述中仍可见先秦诗歌的印记——整齐的句式。将诗整齐的句式运用到文中，增加了寓言的节奏感、韵律美，让人读之朗朗上口，这是种传承，也是种创新。如《孟春纪·贵公》篇中“大匠不斫，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兵不寇。”^{[7]25}《季春纪·先己》篇中“故心得而听得，听得而事得，事得而功名得。”^{[7]80}“得之于身者得之人，失之于身者失之人。”^{[7]82}《有始览·谕大》篇中有“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7]402}一段中使用“……不成，既……矣”的句式六次。

（三）思辨性的语言

《吕氏春秋》的寓言无论叙述故事，还是揭示寓意，都处理得很有智慧，体现出思辨性特征。如《先识览·知接》篇中说话很艺术，把不能听进贤者之言，说成是因为智力所及范围很近，不能理解贤人话的意思。借此劝谏君王要举用贤人，采纳忠言。鲜明的句式也有不少，如《仲春纪·贵生》在谈论养生之道时，从耳目鼻口入手，耳朵想听音乐，眼睛想看彩色，鼻子想嗅芬芳，嘴巴想尝美味，但是只要对生命有害就会被禁止。由此推出各种官员也不得独断专行，要有所节制。《季春纪·先己》篇指出“顾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7]81}《季夏纪·制乐》篇中提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7]176}《孟冬纪·异宝》篇中“其知弥精，其所取弥精；其知弥粗，其所取弥粗。”^{[7]301}这些表述充满哲学意味，有些句子现今仍是脍炙人口的名句。

《吕氏春秋》集各家之长，创作出不少丰富多彩的寓言，其叙事模式对后代文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是对后世寓言的影响。它成为后世寓言题材的来源之一，如《淮南子·说山》《说

苑》《新序》。后世寓言在叙事方式上多循于此，如《淮南子》的叙事结构和《吕氏春秋》最为接近。可以说，《吕氏春秋》的寓言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承袭了先秦寓言的特色，又为后代寓言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同时，“寓言故事群”的方式，启发了类书的编纂。王启才认为《吕氏春秋》“实类书之祖，后世《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其编纂方法及体裁，借本于此。”“实千古类书之先河。”^[9]二是对后世史书的影响。《史记》被称为纪传体通史，它的叙事手法以“互现法”著称。其源头可从《吕氏春秋》寓言里“寓言中套寓言”的方式中可见一斑。三是对后世小说的影响。《吕氏春秋》的寓言在叙事过程中运用多种修辞手法，使叙事更加生动、形象、可读性强，这影响了后世小说关注语言的灵活运用和情节的跌宕起伏，如志怪小说《搜神记》等。另外，现代微型小说中“限知视角”的手法，受到它“用对话展开故事情节”方式的影响。总之，《吕氏春秋》寓言的

叙事模式在结构编排、表达方式和语言运用上都作了细致考究，否则不会有“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的自信。^{[1]701}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 [M]. 长沙：岳麓书社，2004.
- [2] 洪家义. 论吕氏春秋的性质 [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4)：156.
- [3] 郭预衡. 中国古代文学史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2.
- [4] 陈蒲清. 中国古代寓言史 [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67.
- [5] 傅修延. 先秦叙事研究 [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267.
- [6] 赵逵夫. 论先秦寓言的成就 [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7)：31.
- [7] 陆玖. 吕氏春秋译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 [8] 赵海利，谭家健.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130.
- [9] 王启才. 吕氏春秋研究 [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35-36.

Discussion on the Narrative Mode of Fables in *Lv Shi Chun Qiu*

Zhao Jing

(Chang Qing College,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 *Lv Shi Chun Qiu* draws the good points from prose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makes sense through fables. In the group of allegorical stories, the group of allegorical stories connected and unconnected in content are skillfully integrated. In the same fable, the combination of narration and discussion is adopted, and the fable is set up in the fable with appropriate details, which enriches the connotation of ontological fable. The story is narrated in a “dialogue” way, which makes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compact and the sense of reality enhanced. A variety of rhetorical devices, neat sentence patterns and speculative language have mad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of literature, which influence the fables, historical books and novels of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Lv Shi Chun Qiu*; Fables; Narrative mode

[责任编辑：殷月琴]